

環境與世界 第十一期：33 頁～64 頁（200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Environment and Worlds (11)：33～64（2005）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澳洲台灣移民相關議題之研究

### Current Research on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楊智翔<sup>\*1</sup>、姜蘭虹<sup>\*2</sup>、廖珮君<sup>\*3</sup>

Chih-hsiang Yang、Lan-hung Nora Chiang、Pei-chun Liao

####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藉由回顧與澳洲台灣移民研究相關的文獻，以了解台灣移民在澳洲的生活狀況，並對於政策的制定及未來研究方向提供建議。從澳洲普查資料中得知，台灣移民有年輕化的趨勢，教育程度高，並且認為自己英文能力是好的。然而在近期僑委會調查報告中卻發現，有近四分之一的台灣出生移民認為自己的英文能力不好，文化及語言的障礙成為他們在澳洲求職的最大困擾。同時由於欠缺當地文化資本、專業證照不被承認，以及在經濟上沒有迫切需求，也不願意做比較低下工作的態度影響，以及受到種族歧視，造成他們在澳洲的就業率與當地人及同為華人的中國大陸及香港比起來並不理想。自行創業者雖然在抵澳前後的行業及職業不變，但在經濟規模上卻比在台灣時縮小許多，造成部份移民回流的現象。在移民的居住地選擇與流動方面，台灣移民在選擇居住地時會考量子女就學需求、妻子兒女交通便利及安全、購物方便、風水等因素。當他們初抵澳洲時，會選在親友居住的鄰近地區，等到熟悉當地環境之後才開始依照自己的需要找尋居住地，並擴大選擇的範圍。台灣移民在澳洲的住屋擁有率高，除了自身的經濟實力外，他們選擇居住地的決策機制在於需求、能力

---

\*1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

M. A.,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Taipei Municipal Teachers College



與適應的歷程三者要素間的相互影響，並從家庭觀點做整體思考。

許多台灣家庭由於「太空人」的現象而導致了女性戶長家庭的增加，並造成台灣出生移民的性比例偏低。部分太空人家庭中的「單棲媽媽」原本在台灣職場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移民後卻離開勞動市場及原來的人際網絡，在跨國家庭中，擔負照料子女的工作，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她們不斷掙扎著如何在小孩與先生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並承受在新環境下的不利因素。她們在遷移後雖安定地居住在當地，卻在地方上發展出另一種人際互動網絡，顯現出特殊的適應方式，呈現出全球化遷移下的另一種地方化。

在年輕移民的適應與回流方面，主要討論的是在台灣出生，之後隨父母移民的小孩在澳洲的生活適應及長大後的就業與回流情形。年輕移民回流台灣主要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並受到家庭團聚、找對象及對台灣的情感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不回流的主因則為已經習慣澳洲。年輕移民在澳洲必須面臨英語能力不足、課業壓力、家庭型態和人際關係改變等適應問題，並因此影響到他們的身分認同。年輕移民的文化認同則是融合台、澳文化元素的雙重文化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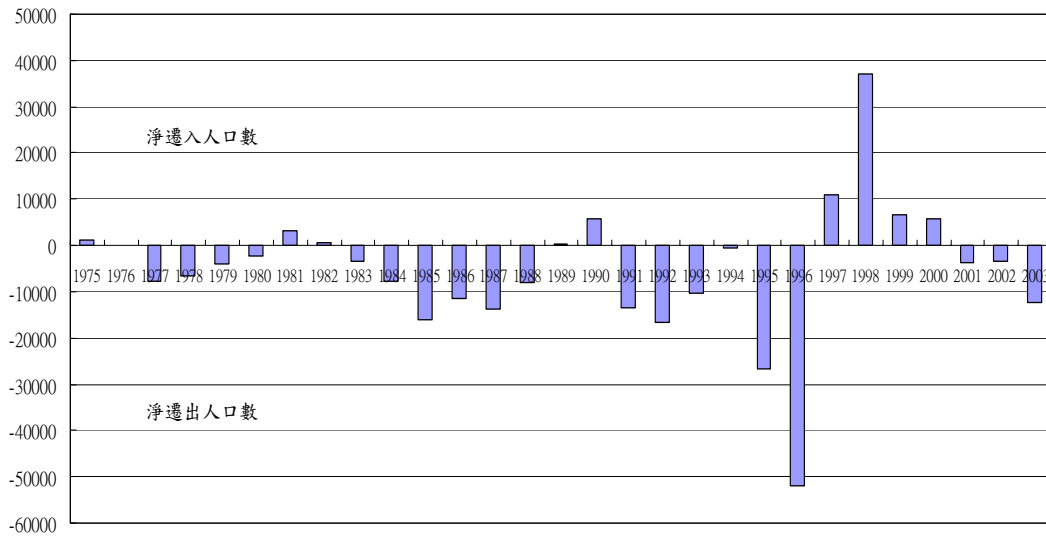
本文為綜合性的探討，顯示出移民問題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對政策制定的啟示為：不論是移出國或移入國，都應考慮到移民的特殊性，以期制訂出有效且合理的移民政策。

**關鍵字**：澳洲台灣移民、就業與社會適應、居住地選擇與流動、單棲媽媽、回流年輕移民

## 研究背景及目的

台灣在 80 年代之前，人口的結構可視為一個「封閉系統」，移出或移入人口並不多，使得台灣人口結構一直呈現穩定的狀態。根據內政部的台灣人口統計所見，1984 年開始，遷移人口的移出顯著大於移入，特別是在 1996 年（圖 1）。近二十年來，台灣人口的國際遷移，已成為學者加以關注的新興人口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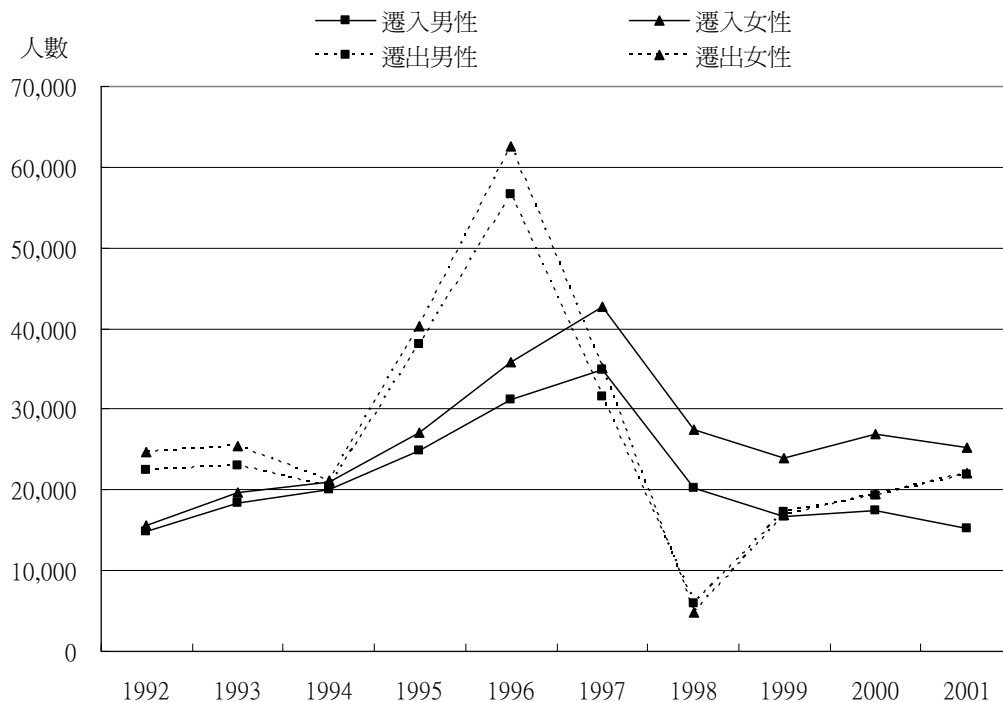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內政部 (2004)，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

圖 1 台灣人口淨遷移現象歷年資料 (1975-2003)

圖 2 顯示，不論是遷入或遷出台灣，女性所佔人口比率都較男性為高。國人移出的目的地以已開發國家為主，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日本、新加坡等。而移入台灣民眾的來源多來自開發中國家。從 1990 年代開始，女性移民的人數不只較男性多，而且牽涉的議題更為複雜。

台灣國際移民的多樣性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與早期的情況很不一樣，也導致政策制定者在這方面深切的關注。本論文將過去台灣移民相關文獻做一回顧，重點放在近八年來 (1998-2005) 的澳洲台灣移民研究，希望可以對相關研究者有所啟發，並且能為台灣移民政策制定有所幫助。





資料來源：內政部 (2002)，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

圖 2 台閩地區移入移出人數 (1992-2001)

過去至今，我國移民人口政策一直是「移出從寬、移入從嚴」。1989 年政府開放出國觀光旅遊的政策，大大增加了移出人口的數量。除此之外，由於國民所得增加、害怕中共武力威脅的恐慌心理、政治的不穩定、社會治安不良、加上許多移入國如紐、澳等鼓勵移入政策、移民仲介業的發達，都成為國民移出的重要考量因素 (Laquian, Laquian, and McGee, 1998: 176; Beal and Sos, 1999: 40; 徐榮崇、姜蘭虹, 2000)。80 年代開始，台灣中產階級崛起，這些人在所得增加之餘，除了經濟上的追求，更開始注重自身及家庭生活品質的提升；而當時台灣在自然環境方面，工業化後帶來大量污染，造成生活環境不良；政治社會方面，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國內政治的動盪，以及當時幾起重大的社會犯罪案件也都使得這些新興的中產階級感到恐慌。為了追求更佳的生活環境及子女教育而出現了新的移民潮。這些因素導致近二十年來台灣移民的增加。這類移民的型態跟早期華人移民多是為了改善貧困生活，而遠赴海外謀生，如：華工或是留學生出國留學所形成的移民潮是不一樣的。

身為亞洲四小龍 (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 的經濟體 (economy) 之一，台



灣移民也成為「亞洲新移民」的一部分。這類移民有年輕的人力、資金、學歷、並具有一定社經基礎的優勢，頗受到移入國的青睞。其中國人移民選擇最熱門的移入國為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日本。全球化的衝擊也使得台灣人在居住國家的選擇性上更為多樣，所面臨的挑戰也更加複雜。

各移入國之間的移民接受政策、生活條件、都有所不同，必然會對移入者的適應狀況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國移民政策中對移出人口的福祉，勢必要建立在對這些移入國的了解之上。不同的國家內部有著不同的移民法律；內政部在 2003 年將國人主要移居國家對於移民者移入國籍與身份的相關法規加以翻譯與編印。但是現今政府在移民政策制定時，對於台灣移出人口的動態認識不多，學界也少有針對此一領域進行深入研究。蔡宏進 (1988) 曾經提到，「雖然晚近台灣有關出境及移民政策逐漸開放，…… 學界與政府的了解都極為有限」。內政部在擬定移民政策相關事宜時，多是針對移入台灣人口方面 (如外勞、外籍新娘等)，對於台灣移出人口了解及相關幫助較少。本文認為，移入及移出地區政府機構與學者，都需要在移民的各方面課題加緊腳步來了解，以便於政府對於國人移居國外者提供輔導、協助與保護。

移民的因素、適應過程是相當複雜的，如果單從移入國的人口普查去了解是不足夠的，真實情況仍需進行移地研究才得以深入認識。而從事移入地的研究不易進行，需要政府單位的支持 (包括經費及人力)，及學者的堅持才能順利進行。本論文將過去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分做兩部分加以探討：第一部分植基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所出現的文獻；第二部分則是近八年來 (1998-2005) 的澳洲台灣移民研究，希望藉由文獻回顧的建立，對於政策制定以及未來研究方向提供建議。

## 八 0 年代後台灣移出人口相關研究回顧

過去台灣移民人口研究多關注於國內的人口遷移，有關台灣人民國際遷移的出版論文非常有限，且研究地區幾乎集中在美國與加拿大，對於其他地區的台灣移民甚少涉獵。其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向：移民型態的轉變 (曾熾芬，1997；陳靜瑜，2003a，2003b)，早期移民空間聚集所形成的組織及其演變的探討 (何翠萍，1977；林芊，1986；陳靜瑜，1996，1998)，移民者代間觀念差異 (林芊，1987) 等。以下對於這些研究結果做一簡單敘述。

陳靜瑜 (2003a，2003b) 從時間與歷史的面向探討，認為移民動機與移民方式，在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政策下，早期的台灣移民與近期台灣移民已經產生差異，進而影



響了這些移民在移居地的活動與居住型態。而曾熾芬 (1997) 從供給與需求的經濟面向指出，現今的移民管道較傳統移民方式是以勞動力交換居留權更需要專業基礎，因而有了移民仲介的出現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她也提出在「經濟效益」導向的移民背景下，會使得地主國與移民者間產生一些社會認同與資源分配上的問題。

在居住地研究方面，國內學者雖多針對美國地區的中國城（一稱「華埠」）此一華人移民聚居的地理空間為研究對象，但都是從此一空間的變遷及其對華人社會的影響為焦點。如何翠萍 (1977) 及林芊 (1986) 歸納中國城的形成大體上可歸結於華人本身特殊之文化移民型態，以及美國社會的歧視兩個原因。且都得到其影響力已日漸衰退與式微的結論。並與移民型態的轉變這個影響移民移入後行為的結構性因素扣連 (陳靜瑜, 1998, 2003b)。

林芊 (1987) 則探討移民之後，兩代移民間的文化認同上的差異。對於兩代的文化認同上，林芊認為第二代移民會表現得較第一代移民更以父母為考量，但同時也會更強調個人。同樣認為第二代會較為認同個人主義為特色的西方文化，馬宗潔 (1999) 也指出移民的第一代與孩子會遭遇文化適應上的差異所產生的生活方式不同，而在教育上感覺挫敗與不滿足。

基本上，國內對於移民國外的台灣移民研究，大多以整體性的社會變遷與趨勢為議題進行，較少從移民者本身以及空間的觀點和研究方法出發，如對自我與國族的認同、生活適應與居住地選擇等面向，以致於雖然能從中略窺移民社會的概況，卻無法得知不同移民者間的差異性。而從移民過程的參與者以及漫漫長篇的華人移民史來看，一個移民者從決定移民那一刻開始，到在移入地定居，甚至延續至其子孫，都仍在整個移民的過程當中。其間環環相扣的各個面向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若單從針對外在環境因素加以探討是不足夠的，且只能引以為參考，真正的深入認識仍需要從移民者自身內在的觀感 (即 voice of immigrants) 出發，才得以獲得較完整的圖像。

## 台灣人口移民澳洲之研究回顧

雖然澳洲開放移民從二十世紀初即已開始，而台灣人開始大量移民澳洲卻始於 1980 年代中期；澳洲的台灣移民相關研究，則自 90 年代末期開始出現，研究者除了台灣的學者之外，亦包括了移入地的華人及澳籍學者，如：Wu, Ip and Inglis (1998), Ip (2001), Ip (2003) 及 Wu (2003) 等。因此本文回顧近幾年來 (1998-2005)，有關移居澳洲、紐西蘭之台灣移民的研究成果，與這些移入地區其他的華人研究成果對話，以



勾勒出移民的重要議題。以下分成六個段落，分別從：當前移民的背景、澳洲移民政策、移民的就業與社會適應、居住地選擇與流動、太空人家庭中的「單棲媽媽」、年輕第一代的適應與回流等，切入並了解在澳洲當地台灣移民的生活處境與適應，及所面對的各項議題。

## 1. 澳洲移民研究背景

在國際人口遷移的文獻中，亞洲人口遷移近 30 年以來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受到亞洲移民潮的衝擊，移入國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者開始積極進行亞洲移民的研究，同時亦得到移入國政府及國際學術基金會（如：C. C. K. Foundation, Toyota Foundation）的補助，使得有關亞洲移民的研究及學術活動在移入國相當的活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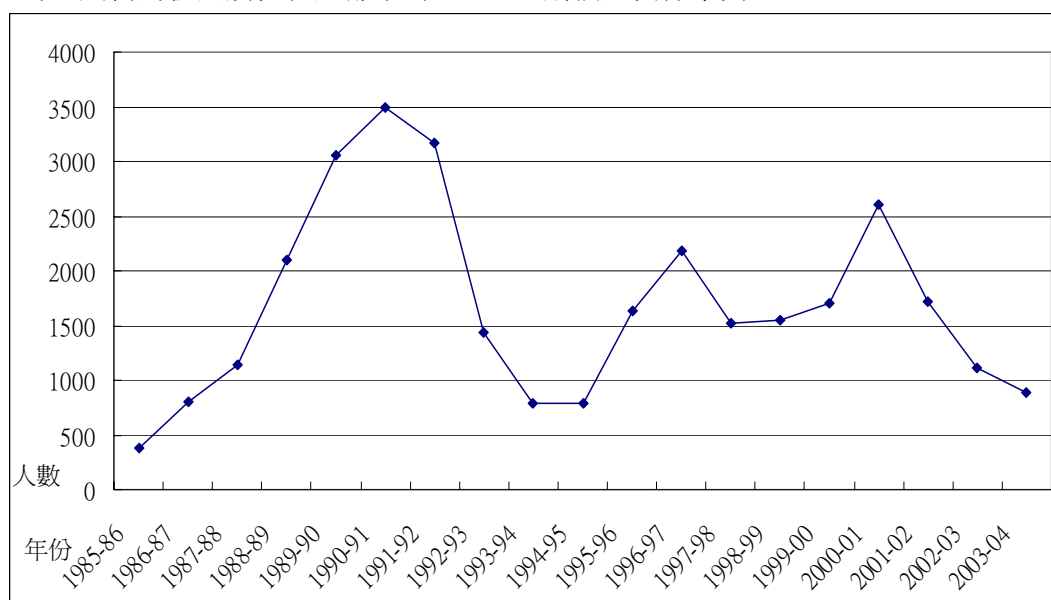
Skeldon (1997) 認為海外華人中的新移民，對移入國的文化、經濟及政治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從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新加坡的移民，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之間，移至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的數量增加得最快。其中，有不少是「亞洲新移民」（'New Asian Immigrants'），所指的是擁有高教育程度、技術或從商經驗的亞洲人，藉由申請商業或技術移民，而進入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先進國家 (Inglis and Wu, 1992)。

由人口統計資料中，姜蘭虹、趙建雄、徐榮崇 (1998) 針對戰後華人移民美國、加拿大及澳洲作一初步的了解，並嘗試分析其趨勢、特徵、移入地的政策、及其社會經濟意涵。依序討論了：1) 美國的華人移民 — 二次世界大戰後之移民趨勢、移民的管制與政策；2) 移民加拿大的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人 — 其分布型態及趨勢；3) 移民澳洲的華人 — 分布、特徵及移動型態以及澳洲的台灣人等三項議題。

當代移往北美的與澳洲的華人遷移者，以技術、投資和依親為主要動機，經常往返於母國與移入國之間，形成了所謂的「太空人」家庭，而與以往的移民型態相異。大量已經移入地主國家的華人，仍然回到母國，對於西方家庭所定義的「國家」及「公民義務」(citizenship) 涵義，更產生了重大衝擊。在香港、中國大陸、台灣三地的移民中，台灣向外移民起步的最晚且最集中。雖然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接納大量華人的國家中有著豐富的普查資料，但是普查卻通常將以華文為母語的人歸在一類，而忽略了華人內部的差異性。為了解華人移民的複雜性、以及這些移民所建立的跨國文化及商業關係，迫切需要對來自不同地區或國家的華人移民及其所居住之社區從事較徹底的研究，以彌補傳統依賴普查資料研究之不足。並同時使用澳洲普查 (1986, 1991, 1996, 2001)，作為了解台灣移民在當地各方面的背景資料。



從澳洲的普查資料中得知台灣移民由 1986 年開始，到 1991 年移入人數成長了十倍，移民總人數在 1991 到 2001 之間，則增加了將近一倍。台灣移民定居人數 (Taiwan settlers) 的高峰是在 1990-1991 年以及 2000-2001 年 (圖 3)。台灣在 1991-1992 年的移入澳洲國家/地區中排行第八。台灣移民的居住地大多聚集在都市，其人口分布概況如圖 4，多數台灣移民選擇居住在澳洲東岸的昆士蘭省、新南威爾斯省、維多利亞省，及西澳洲省，主因在於澳洲的大都市多在這些省份內。1996 年的普查顯示，有 82.9% 的台灣移民的住所集中於雪梨 (新南威爾斯省)、墨爾本 (維多利亞省) 及布里斯本 (昆士蘭省) 三大都市 (徐榮崇、姜蘭虹，2001)；而在 2001 年的普查中，居住在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這三個主要都市的台灣移民則佔 84.6% (如表 1)。若計入該年在西澳省最大城市伯斯的台灣移民人口 (共有 829 人，佔總移民人口的 4%)，則台灣移民居住在大都市為 88.6%，所佔比例非常高。



資料整理自：DIMIA, *Settler Arrivals*, various issues.

DIMIA (2002) *Australian Immigration Consolidated Statistics*, various issues, <http://www.immi.gov.au>

DIMIA (2002) *Immigration Update*, <http://www.immi.gov.au>

DIMIA (2004) *Settler Arrivals 1993-94 to 2003-04*, <http://www.immi.gov.au>

圖 3 歷年澳洲台灣出生移民居留人數趨勢圖，1985-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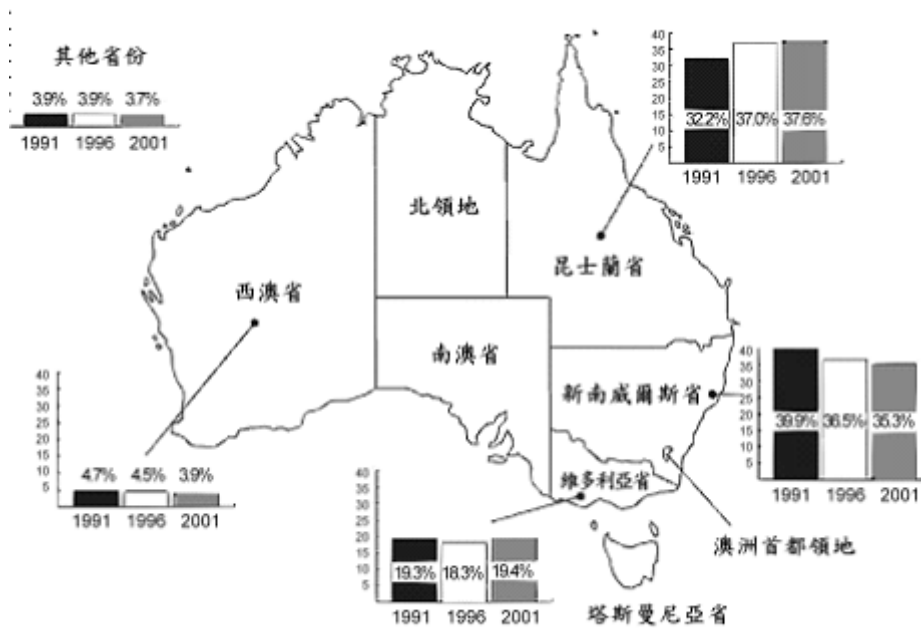


表 1 台灣出生移民在三大都市中的分佈情形，1991-2001

單位：人/百分比

都市	1991		1996		2001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雪梨	4,921	38.0	6,729	34.4	7,502	33.5
墨爾本	2,413	18.6	3,432	17.6	4,248	18.9
布里斯本	3,600	27.8	6,038	30.9	7,205	32.1
小計	10,934	84.4	16,199	82.9	18,955	84.6
其他	2,024	15.6	3,348	17.1	3,463	15.4
總人數	12,958	100.0	19,547	100.0	22,418	100.0

資料整理自：澳洲普查統計局 1991, 1996, 2001 年未出版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1) Unpublished Census Data, 1991, 1996, 2001

圖 4 台灣出生移民在澳洲各省的居住地分佈

根據澳洲統計局 2001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台灣移民澳洲的人數共計 22,418 人。2001 年的台灣出生移民年齡中位數為 25 歲。相較於同年澳洲海外出生人口平均年齡 46 歲及全澳洲人口平均年齡 35 歲，可知台灣出生移民的年齡結構較為年輕。在教育程度上，台灣出生移民擁有學士以上學歷的有 26.8%。2001 年的普查資料尚顯



示：台灣出生移民在家使用的語言以普通話 (Mandarin)、閩南語和客家話為主。認為自己英文能力很好或只用英文的人有 74.6%，認為自己英文能力不好或完全不會英文的有 24.3%。Wu (2003: 369) 的研究指出在澳洲的華人中，台灣移民較常感受到種族歧視，很可能與語言的障礙有關。而且，語言的障礙還是台灣移民在澳洲求職上最大的困擾 (姜蘭虹、宋郁玲，2001；Chiang, 2004a)。

2001 年台灣出生移民的失業率為 15.9%，相較於 1996 年的 19.6% 及 1991 年的 26.9% 有逐年降低的趨勢，但是相對於來自大陸 (2001 年, 10.1%)、香港 (2001 年, 7.8%) 和全澳洲 (2001 年, 7.4%) 而言，台灣出生移民的失業率是比較高的。其原因和台灣移民在移民前身份大多是企業主，對於經濟上需求並沒有非常的迫切，而且也不願意做比較低下的工作有關 (姜蘭虹、徐榮崇，2000)。

從人口普查所見，2001 年台灣出生移民的性比例是 82.8 (女性為 100)，主要原因是丈夫移民後成為「太空人」，導致了女性戶長的家庭增加。台灣出生的女性移民較男性高，尤其是在 35-54 歲的年齡層上。相對於大陸及香港出生移民的 87.4 及 94.0，台灣出生移民的性比例是較低一些。另外，15-24 歲的年輕男子的比率較高，則是因為男孩比女孩出國受教育的機會較大，這種現象也可以從香港移民研究看到類似狀況。Kee and Skeldon (1994: 189) 發現許多香港移民會將 10-19 歲的小孩送到澳洲繼續學業，而在 30-39 歲的移民當中，女性所佔的比例是遠較男性高的。

## 2. 澳洲移民政策

澳洲是一個典型的開放性移民社會，至 2003 年 6 月統計，澳洲人口約有一千九百八十八萬人口，根據 2001 年澳洲統計局統計，有 23.1% 的人口出生於海外。若包含雙親中有至少一人是出生在海外的入口，則佔全澳總人口數的 43%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3)。

過去五十年來，澳洲的移民政策從只允許白人進出澳洲的白澳政策轉變到包容各族裔的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 移民政策。二十世紀前半段的移民主要來源是盎格魯及凱爾特族裔 (Anglo-Celtic)，同化 (assimilation) 為政府主要的政策 (Makkai and McAllister, 1993: 180)。之後於 1960 年代改以融合 (integration) 為導向的政策，移民仍侷限於歐洲地區的族裔所組成。及至 1970 和 1980 年代，移民來源區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 — 由最早的英國轉向歐洲進而擴大為亞洲，而且政府的政策也轉變為接受移民者母語及其文化的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政策。以時期來分，澳洲的移民政策可分為三個時期：



- (1)同化政策 (1901-1947)：澳洲自 1901 年開始成立聯邦議會，並同時實施「移民限制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又被稱為白澳政策 (Lack, 1995)。一方面宣示澳洲是屬於白人的澳洲，另一方面，則以優惠措施向英國招募移民。為了要保障白色人種為移民的主要種族，澳洲政府要求所有的移民族群都必須接受同化。同化政策本身就是一種種族主義，是主張較次級的人種必須具備能力去轉換自己成為和白色人種一樣，而且還要像他們所認為的白種人一樣好，也就是希望在同一文化的洗禮下，到移民第二代時，不同的文化及語言都將消失 (Kalantzis, 1997)。
- (2)同化到融合 (1947-1972)：二次大戰後，澳洲即開始第二次的主要移民潮 (Western, 1983)。由於二次大戰日軍的侵犯，使其意識到國防安全力量的重要，以及戰後為了維持經濟的水平；然而光是仰賴國內的勞動力並不足以支持。同時，也因二次大戰的關係，英國海運能力大幅衰退，以致無法達成澳洲政府預計的移民人口數量。因此，為使國力更加強大的前提下，其便積極並計畫性的招收移民，也將移民來源的範圍擴大，由北歐，進而至中歐、東歐，再擴及南歐地區。但由於這些來自非英國的歐洲移民（一部分為難民移民）許多是不懂英文的，而他們的生活習慣與文化傳統也與英國不盡相同，因此有許多移民在無法完全同化於澳洲社會的情況下回流，在 1959 年到 1965 年間，有 15% 的移民回流至原居國 (Western, 1983)。另外，由於這些移民很多所從事的工作並非專業性，也不需要英語能力，因此也不需要同化於澳洲社會。而澳洲也在逐步擴大移民招收的範圍下，廢止了聽寫測驗並訂定新的移民法案取代原有 1901 年所制定的移民限制。
- (3)多元文化主義 (1972 之後)：1966 年澳洲政府全盤討論非歐洲國家移民的政策，1972 年工黨執政後，白澳政策正式宣告結束，並在 1978 年制定了 57 條政策目標，確立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方向。他們除了同意接受學歷高的亞洲人移入，也放寬了非歐裔人士合法在澳洲土地居住的條件。多元文化，通常指的是「多種族裔(multi-ethnic)」或「文化的多樣性 (culturally diverse)」。這表示不同種族的移民可以保留他們的文化和語言，因此多元文化主義，不僅接納，而且加強了各族群的文化與語言的保存。

1980-90 年代，澳洲對於「算不算是亞太地區國家？」的問題進行討論。由於澳洲的國家安全與亞太地區的穩定息息相關；且當時澳洲正致力於改變本身的經濟結



構，由傳統製造業取向轉而為服務或知識基礎 (knowledge-based) 的工業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體系 (Ip, 2001)，需要大量的專業人員。除此之外，他們也鼓勵能帶來大量資金的移民。因此，1981 年起，澳洲開始實施商業移民政策 (Business Migration Program, 以下簡稱為 BMP)，吸引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技術人才與企業團體移民，並在 80 年代中期積極推銷其教育機會。台灣移民自此開始較有規模移往澳洲。在此之前，台灣人希望移民者考慮移民的國家仍以美加為主。

由於本身的區位以及經濟發展的考量，澳洲的移民政策轉向，招收移民的視角逐漸由歐洲地區轉往較有區域關係的亞洲，而鎖定的對象也逐漸以帶有專業技能或大量資本的技術與商業移民，這樣的轉變是不令人意外的。雖然澳洲推行 BMP 時間較美國、加拿大晚，但其成效卻非常顯著 (Wong, 2003)。然而，移民在移入國的適應成功與否，並非光看移入國移民政策就可評斷的，在正式政策的背後，一位移民者真正進入移入國後，當地政府能對他們提供的照顧，及當地居民對新住民的接受程度，才是更令人關心的。Jayasuriya and Kee (1999: 73) 認為，雖然從社會經濟指標可以見到亞洲移民融入澳洲的努力，但是當地社會人士對亞洲移民的態度，仍然不夠肯定。根據 Simon and Lynch 在 1991 年調查發現，澳洲人當中有 68% 的民眾是希望見到移民人數減少的。此外，相較於本地出生的居民，外來移民較不容易獲得福利給付 (Stalker, 2002)。

### 3. 移民就業與社會適應

台灣的移民會迅速增加主要是因為商業移民政策，因此其中移民主要為商業移民；近年來技術移民 (skilled migrants) 的人數亦不斷增加。雖然台灣移民是以商業或技術移民的方式進入澳洲，卻很少在移民前就開始在當地建立事業或尋找工作 (Ip, 2001)。因為不論是商業移民或是技術移民，他們都會帶著大量的資金，好讓他們在剛搬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有經濟上的負擔。在此同時，他們並沒有結束在台灣的事業，以致於在安頓好家人之後，丈夫或家庭經濟的來源者，必須要回到原居地繼續事業的運作，並不斷地往返兩地 (姜蘭虹、徐榮崇, 2000)。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同為華人的香港移民身上，這種不斷往返原居地以及移入地的人，常被形容為「太空人」(astronaut) 或「空中飛人」(flying trapeze) (Tam, 2003; Pe-pua et al., 1996; Mak, 2001)，這個議題將在後面的段落介紹。

在移民的就業研究方面，台灣移民在澳洲的就業率似乎不太理想，根據普查，1996 年台灣移民的失業率為 27.7%，雖然在 2001 年台灣出生移民的失業率為 15.9%，



已較 1996 年降低許多。但仍高於同為華人的中國與香港移民。Chiang and Kuo (2000) 的研究發現，澳洲當地種族歧視可能是造成台灣移民就業不利的因素之一。而在姜蘭虹、宋郁玲 (2001) 的研究當中發現，不論是在創業或就業上，台灣移民都遭遇到語言、文化、與就業市場各方面的困難與阻礙。Wu (2003) 及 Chiang (2004a) 的研究也強調語言的障礙還是台灣移民在澳洲求職上最大的困擾。

然而除了移民者欠缺當地的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其本身對於工作選擇的態度也是使得台灣移民失業率偏高的原因。由於移居前這些移民多屬社會中產階級，但在準備投入澳洲當地勞動市場時，他們對於那些比昔日在台灣的理想職業還要低階的工作顯得興趣缺缺，加上一些專門職業人員 (如醫師、牙醫、獸醫、教師、工程師) 原先在台灣持有的職照，在移入國中並不承認，更使得這些原先有一技之長的技術人才在當地無法得其所用 (Chiang, 2004a)。這種狀況與紐西蘭的台灣移民非常相似 (Ip, 2003)。

將台灣移民在移民前後的職業做比較後發現，主要都還是從事在台原來的職業與行業。多數台灣出生的移民從事零售、房地產與商業服務及批發 (retail trade, property and business services, wholesale trade)，其次為住宿與餐飲業、製造、健康與社區服務、教育、金融與保險 (accommodation and restaurants, manufacturing, 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 education, finance and insurance) (Chiang and Kuo 2000)。另有許多人為自行創業。而雖然這數據似乎表示受訪者抵澳前後的社會流動情形不變，事實上當他們在面對現實的生活問題時，或多或少也會找些小生意做做，亦即所謂的自營事業 (self-employment) 或族裔事業 (ethnic business)，這使得他們在收入及創業的經濟規模上已經比在台時縮小了很多 (Chiang, 2004a)。

除了英文能力不足使移民者在就業與創業上感到非常的困擾之外，對當地生活及文化適應的經驗不足、不瞭解當地的法令規章、無法打入澳洲社會等因素，亦是這些台灣移民在就業與創業上所面臨的難題。而台灣移民的「太空人」家庭特性，在生活適應上也成為困擾，當他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第一位想求助的對象是家人，其次是親戚，再來是台灣鄉親，但由於和家人分居兩地，使得這些期望得到的幫助都變得緩不濟急 (姜蘭虹、徐榮崇，2000)。

Schak (1999) 指出，雖然台灣移民多以經商理由移民，但卻多經商困難。其留在澳洲的主要原因也許不在經商而另有其他因素，例如讓小孩在無壓力的環境接受教育和居住在空氣清淨、開放空間大及良好的自然環境。雖然整體看來澳洲台灣移民的經



濟背景與遷移後狀況表面上都不錯，然而這些移民所面對的問題卻也不少。然而台灣移民因熱心投入社會與政治事務而聞名於紐澳，突顯其獨特的國族認同(Ip, 2003)，且在工作之外，他們對於參加宗教與志工團體亦具有相當熱忱。這一點，是與其他華人移民相當不同之處。

部份移民由於經濟來源與社會適應問題，因而產生回流 (return migration) 的意願。而有關年輕移民在澳洲的適應情形，由於目前並沒有相關研究佐證或支持，因此較難得知他們是否擁有較上一代更多的社會資源或網絡，以及他們是否具有不同的調適機制以支持融入澳洲當地社會。關於目前台灣年輕移民的初步研究發現將在後面段落中加以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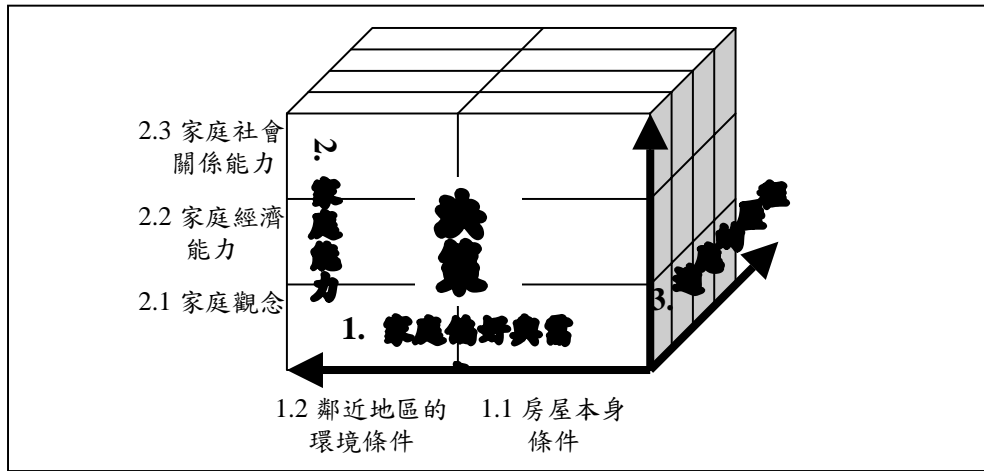
#### 4. 居住地選擇與流動

由於台灣移民是跨國性的遷徙行為，因此他們的背景、文化與遷移動機和一般當地人在選擇居住地時考量意涵與關注是不同的。舉例而言，多數台灣移民為了子女教育的特定目的來到澳洲，在考慮居家條件時就會特別以子女需求為重心，這和一般居住地改變遷移者有所不同。另外，有些男性移民在安置好家人後，便回到台灣繼續其事業，採取獨留妻小在澳洲生活的「太空人」家庭方式，這也會使他們在選擇居住地時會以妻小為主要考量對象，考慮到是否安全、方便，或與親友聯繫及照顧是否容易等因素 (徐榮崇、姜蘭虹，2004)。

徐榮崇在其博士論文 (2002a) 中指出，一般來說，台灣移民在初抵達澳洲時，居住地選擇會考量親友的意見，選在親友居住的鄰近地區，並依自己的預算以及子女的教育等因素挑選住所；通常此時他們會以租屋為主。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隨著對當地的熟悉與環境的累積，他們開始依照自己真正的需要找尋居住地，同時選擇的範圍也會擴大。

雖然居住地選擇的決策應是理性的過程，但是實際上仍有著許多非理性的因素隱藏其中。當某一家庭產生遷徙的需求時，是會受到家庭能力的制約而做出對需求的修正，也就是說有了需求後不一定有能力遷徙；相反的，某一家庭有了遷徙的能力時，然而沒有遷徙的需求，一樣不會發生遷徙的動作。當有了需求而且能力足夠時，自然會發生遷徙。當然這整個互動的過程是會隨著適應的歷程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除了他們自身的經濟實力外，台灣移民會因在澳洲居住時間的長短與適應的歷程而選擇自己的居住區域。因此居住地選擇的決策機制在於需求、能力與適應的歷程三者要素間的相互影響 (如圖 5)，並且應從整個家庭的觀點來做整體的思考 (徐榮崇，2002a)。





資料來源：徐榮崇 (2002a)。

圖 5 台灣移民居住地選擇的決策機制

Hugo(1995)認為，相同出生地的移民族群，有集中於特定區域的趨勢，這會影響整個澳洲人口的分布型態，也會增加因種族集中而產生的社會、經濟或是政治分歧的問題。由於澳洲台灣移民在台灣是擁有較豐富的財力和較高的社經背景，在這幾個主要的都市中的幾個地區形成了台灣移民聚集地區，因此，對於當地的社會、經濟、政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徐榮崇、姜蘭虹，2001)。

另外，原先在台灣居住於不同都市的人，其移民到澳洲之後也會各自有聚集的居住地區。主要考慮的因素仍為子女教育、交通便利性以及是否有台灣人居住在附近等。台灣移民同時也較偏好獨棟的房子，但時常購買房屋之後自行裝潢，甚至自行購地興建房屋，由於居住習慣與當地人不同（如喜愛新屋及大房子、築圍牆），這些房子的風格往往與當地房子的型式格格不入，使得台灣移民的房屋轉手困難，轉手時也只能再賣給台灣人，並產生連鎖遷移 (chain migration)，因此常常在一家台灣移民定居之後，該地區慢慢會形成台灣移民聚集居住的地區。這也成為台灣人聚集的原因之一，如布里斯本的 Sunnybank 地區。而 Burnley (1998) 則以香港人為例，指出有 45% 居住在北雪梨地區，他們集中在 Chatswood 並創造了經濟機會，使此地有「第二個中國城 (second Chinatown)」之稱。這種居住地選擇聚集於郊區的情況，顯然與早期華人聚集於大都市角落的中國城 的情況有很大的差別。

2001 年澳洲普查顯示台灣出生移民住屋擁有率(表 2)為 61.8%(已擁有及購置中分別為 51.2%, 10.6%)，較 1996 年普查的七成略為下降，但仍較澳洲當地居民為高。

由於經貿關係的全球化以及時空的收斂，降低了遷移者所需的時間和費用成



本，某些國際移民的現象已逐漸轉變成類似境內遷移的職業性(career cycle)遷徙。他們打破了國與國之間的界線，為了事業而來回於原居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長期研究國際遷移的學者 Burnley (2001)指出，這種現象可稱是一種跳躍式 (transilient) 的遷移，如此的遷移形式阻礙了在移入地區進行同化或融合，也相對減低了對移居國家的認同，並增加了移民文化的多元性。這和台灣移民的「空中飛人」現象不謀而合。他們雖已遷入澳洲，但透過便捷的交通網絡，仍可與台灣(或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的事業或母社會(homeland)保有密切的往來。這讓他們在移入國家認同上有了遲疑，也讓他們在適應當地生活時，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衝突與障礙 (徐榮崇、姜蘭虹，2004)。Ip, Wu and Inglis (1998)的研究也發現，台灣移民對於教育、家庭與個人的關係、以及對澳洲環境和生活型態的喜好是遠比經濟機會來的重要。近年來台灣移民的小孩已逐漸長大，對於居住地選擇開始考量到大學的需求，而有向市中心區遷徙的趨勢。

表 2 2001 年澳洲台灣出生移民住屋擁有情形

單位：人

住屋型態 (Dwelling structure)	已擁有 (Fully owned)	購置中 (Being purchased)	租借 (Rented)	其他 Others	未填答 Not stated	總計 Total
獨棟獨戶 (Separate house)	4,306	782	668	176	114	6,046
雙拼、連建住宅 (Semi-detached, row or terrace, townhouse etc.)	354	132	768	33	26	1,313
公寓 (Flat, unit or apartment)	528	166	1,943	56	60	2,753
其他 (Other dwellings)	19	0	19	4	-	42
未填答 (Not stated)	38	7	34	3	4	86
總計 (Total)	5,245	1,087	3,432	272	204	10,240
百分比 (%)	51.2	10.6	33.5	2.7	2.0	100.0

資料來源：徐榮崇、姜蘭虹 (2004) 資料整理自：澳洲普查統計局2001年未出版統計資料。





## 5. 「太空人」家庭中的「單棲媽媽」

近年來澳洲受到台灣移民的青睞，成為第三大移入國。過去的研究當中，多半就移民所申請移入的類型而做分類，例如商業移民或技術移民等，而忽略了這些看似主動移民的背後，有一群依附在這些移民類型之下的女性移民，因為配合著他們「空中飛人」的丈夫，而在移民的過程中扮演著家庭支持者的角色。Chiang (2004b) 研究的對象就是這群從台灣移入澳洲的女性移民，也就是所謂的「單棲媽媽」。

姜蘭虹在 2001 至 2004 年，深入訪問了紐澳當地數十位中產階級台灣「單棲媽媽」，發現他們有些原本在台灣職場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當他們進入新的環境時，大多離開了勞動力市場以及原來的人際網絡，在兩地分離的家庭中 (transnational family) 擔負照料子女工作，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Waters (2002) 曾經把這些丈夫回到原居地的婦女稱為「lone mother」或「lone wife」，但並未強調她們在移民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人類學者 Tam (2003) 研究在澳洲的「分居家庭」(split household) 中的媽媽，在澳洲陪伴子女讀書並完成學業後，則會「功成身退」，返回香港與夫家團聚。

這些「單棲媽媽」前身多是中產階級並且具有工作經驗，但是到了移居地後，則被排除於勞動市場之外。除了不斷掙扎在小孩與先生的需求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以及承受許多在新環境當中產生的不利因素等問題外，這些媽媽們通常對於他們現在可以卸下在台灣傳統大家庭當中的責任與脫離夫家的控制而感到開心，並享受她們所獲得的自由與自主性。這些女性移民除了彼此支持與相互聯繫外，她們也在各種類型的台灣社團當中得到一些實際的支持，例如在她們剛到時得到照顧，友誼以及為她們的小孩提供中文教育的資源等。除了要面對調適上的種種困難，她們活躍於移居地的義工的工作。

Man 的加拿大香港移民研究中 (1995, 1996) 指出，許多婦女在移民到加拿大之後，她們的角色地位和權力，都比在香港的時候更壞。過去的在香港擁有專業的職業婦女在移民到加拿大之後，大部分變成低度就業或是失業的情況。

在全球化的論述當中，強調階級是影響移動能力的重要因素。但這群中產階級的女性並沒有因為階級的因素而使得他們有更多的移動自由，反而因為她們的角色，在遷移之後便安定地居住在當地。因此這個現象提供了全球化論述另一種可能的思考途徑。然而，這一群「單棲媽媽」在地方上卻顯現出特殊的創新性。她們在地方上發展出另一種人際互動以及網絡組織，例如組織慈善團體，婦女會等等。Chiang (2004b)



從這些「單棲媽媽」的故事當中，呈現出全球化遷移之下的另一種地方化。

## 6. 年輕第一代移民的適應與回流

不同世代的移民在語言、文化、經濟活動、同化程度、心理認同等各方面，均可能呈現不同的特質(Kitano and Harry, 1969)，這對移民研究而言，是值得重視並加以探討的。過去有關澳洲台灣移民的研究主要是以移民家庭的父母為主要訪問對象，對於隨父母移民澳洲的子女在澳洲的就學、生活適應情形及長大後的就業與回流情形議題是則較少被人討論的。

年輕回流移民的「年輕」具有雙重意義，除了移民時的年紀輕，是跟著家庭、父母一同移入目的地國家之外，他們回流時的年紀也不大，大約在二、三十歲的年齡。年輕移民是移民的「一又二分之一代」(one and a half generation)。這是因為年輕移民是在母國出生後，隨著父母親一同移民到目的地國家，而非在移入地出生的。在身分的認定上，他們屬於移民的第一代，但他們又與在移入地出生的第二代移民相同，都在移入地社會長大，並且接受當地的教育，而非成人移民(Levitt and Waters, 2002)。因此，他們被設定為「一點五代(1.5 generation)」的移民，與在移居地出生的第二代移民小孩做區隔。

台灣移民澳洲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尋求較好的子女教育環境(姜蘭虹、徐榮崇，2000)。但徐榮崇(2002a)認為：其實澳洲並不是完全沒有升學壓力，孩子們到了中學11-12年級，考大學的壓力也很大，要考上好大學並不容易。有些孩子年紀較大才移民，不僅面臨語言上的適應，又要應付升學的壓力，常需要請家教補習，以應付課業上的問題。另外，因為語言溝通不良，常使移民小孩感覺受到歧視，而因為語言及文化不同，也容易形成同族裔群集的現象。Schak(1999)發現台灣移民家庭在澳洲會面臨到的問題有夫妻各處兩地而產生的婚姻問題、小孩有太多錢而染上壞習慣、親子間英文程度不同而產生代溝等問題。徐榮崇(2002a)則認為：有些家庭選擇讓小孩單飛的方式，把小孩送出國，大人並未跟進，這方式能讓小孩出國就學又能兼顧台灣事業和家庭。但對孩子來說，風險很大，常因大人不在身邊，致使行為發生偏差，功課進步緩慢等問題。

廖正宏(1984)認為移民在移入地社會繼續求學，對融入新社會及找尋新工作是有幫助的。Guo and Iredale(2003)的研究也指出，台灣年輕移民到澳洲後繼續升學並取得高等教育學歷，對於他們進入澳洲的勞動市場而言是一個有利的因素。導致第一代移民就業不易的原因，例如：學歷和專業證照不被承認、對澳洲的法令不熟悉、移民



後職業向下流動等問題(Chiang, 2004a)，似乎並未在年輕移民身上發生，然而部分年輕移民仍認為台灣人在澳洲勞動市場就業是較不容易的事，因而選擇回到台灣工作就業。

在「澳洲僑民現況之研究」中(姜蘭虹、徐榮崇，2003)發現，在澳洲僑民的各年齡組中，表示回流意願最多的兩個族群分別是 25-44 歲和 45-64 歲兩個年齡組，其回流原因分別為想「回台就業或創業」，和想要「落葉歸根」。而表示不想回流者，最主要的原因則為「已經習慣澳洲」(見表 3)。

表 3 澳洲台灣移民回流之意願和原因

	25-44 歲	45-64 歲
<b>回流原因：</b>		
投資創業	8.0%	5.0%
就業	13.8%	6.0%
就學	0.7%	0.0%
找對象	1.4%	0.5%
適應不良	2.4%	1.5%
落葉歸根	8.3%	23.4%
其他	1.4%	1.5%
<b>不回原因：</b>		
習慣澳洲	26.6%	31.8%
已有工作	18.0%	9.5%
在澳結婚	9.3%	0.5%
親人在澳	8.0%	12.4%
其他	3.8%	0.5%
<b>不確定</b>	15.9%	17.9%

資料來源：姜蘭虹、徐榮崇 (2003)

廖珮君(2005)針對 22 位自澳洲回流台灣的年輕移民進行深入訪談，希望了解澳洲台灣年輕人的移民過程與經驗、在就業上的優勢與困境及其適應過程、選擇回流台灣或留在澳洲的因素以及自我認同。研究發現，年輕移民移居澳洲後，必須面臨語言的障礙、課業的壓力、家庭型態的改變、人際關係的重新建立等適應問題。其中英語能力不足通常是他們最先遇到、也最需要克服的問題，因為語言能力的關係重大，不論在生活、課業、交友上都是需要跨越的門檻。一旦語言問題克服之後，他們才有餘



力去解決其他的問題；父母親對子女學習中華文化的重視程度和同儕間的文化則會影響年輕移民的自我認同。由於多數的年輕移民屬於被動移民者(“passive” mover)，因此剛到澳洲時，有些人會因為對新環境不適應而產生不滿的情緒，加上有些父母的英語程度也不好，常須依賴家中小孩處理許多對外溝通的瑣事，小孩必須分擔父母親生活各方面的瑣事，也成為年輕移民初期壓力來源之一。

隨著在澳洲社會生活的時間愈來愈長，這些年輕移民們也愈來愈能接受澳洲社會的文化，而產生了思想上的轉變。然而他們的父母，不論在台灣或是同住澳洲，在想法和價值觀上可能都還維持原來的樣子，仍用原先在台灣的那一套標準來要求子女。此時親子之間就會因為觀念上的衝突，形成代溝，而產生家庭內的文化差異。從訪談中初步得知，年輕移民通常會和具有相同背景、有共同話題、文化相近的人交往，進而形成社交圈，以尋求自身的安全感。

年輕移民決定從澳洲回流台灣是受到工作就業、家人團聚、接掌家中事業、尋找結婚對象及對台灣的歸屬感等因素交互影響下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年輕移民選擇回流台灣就業前多半會先評估自身的優劣勢，就讀科系的不同、英語程度的高低及澳洲就業機會和升遷管道的多寡等因素，來做為他們是否回流的依據。回流台灣後，他們又必須面臨中文程度的不足、職場文化不同造成的就業壓力、與家人同住的壓力和缺少人脈等問題。

移民時的年齡和居住澳洲時間的長短，會影響年輕移民移居澳洲和回流台灣適應期的長短，和適應程度的好壞。移民時年齡較大者，由於價值觀和思考模式較為定型，因此較不容易融入澳洲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居住澳洲時間愈長者，則因為習慣澳洲的生活步調和生活方式，回流台灣後的適應期愈長。可以說年輕移民們的適應問題是由外而內的，即他們的轉變是由適應外在的環境，到適應家庭內的文化差異，到思想行為的融合與轉化，而產生一個混合台灣和澳洲文化的新類型出來。

年輕回流移民的身分認同會受到移民時的年齡、家庭教育、同儕群體、移民初期的經驗，以及與台灣連繫的緊密程度等因素影響。移民時的年齡愈大、同儕群體以台灣人的群體為主；移民初期受歧視的經驗愈深，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就愈傾向是台灣人；反之，則傾向於認同自己是澳洲人。文化認同則融合了台、澳兩種文化元素而呈現雙重的文化認同。但兩種文化的比重則受到移民時的年齡、家庭教育的影響、同儕群體、居澳時間的長短而有不同。移民時的年齡愈大，家庭教育對中華文化愈重視，同儕群體以台灣人為主；居住澳洲的時間愈短，受台灣文化的影響就愈大，對台灣的



文化認同部分就較多；反之，移民時的年齡愈小，家庭教育較未顧及中華文化的傳承及教導、同儕群體以非台灣人的其他群體為主、居住澳洲的時間愈長，則對澳洲的文化認同部分就會多一些。

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年輕回流移民多半將重心放在事業的規劃上，有些人表示回流台灣後發現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澳洲的生活，決定回澳洲定居；有的人滿足於目前工作的成就感，選擇繼續留在台灣就業；有的人表示將以台灣為基地，延伸到澳洲或其他地區；也有人表示，只要有好的發展就願意去嘗試，而不限定發展的區域。對於結婚找對象的問題，他們多希望另一半能夠與自己有相同的背景或經歷，會比較容易溝通，也比較能夠了解他們的想法和處境。在下一代教育和退休生活規劃方面，他們則傾向於和他們的父母做相同的決定，留在教育環境和居住環境品質較好的澳洲。

## 結 論

在澳洲的第一代台灣移民，原先在台灣普遍屬於中產階級以上、並較澳洲具有高比例學士以上學歷、且平均年齡較澳洲年輕等優勢，但卻無法打入澳洲就業及創業市場，原因包括：語言無法溝通、專業證照不被承認、不了解當地法令規章及生活習慣等問題。除此之外，造成這種現象還包括其他面向的問題，如：台灣移民移入後與當地產生的文化衝突、移入者的就業與生活適應及產生的社會問題等。雖然澳洲以多元文化主義為移民政策的方向，但移入之後的種種後續政策的配套措施的多元才是真正對於移入者具有實質助益的。

在就業與社會適應方面，台灣移民的失業率偏高，所經營的事業主要以自營事業與族裔事業為主，造成的原因除了上述幾項之外，與這些移民者原先在原居地的身份亦有關係，原先多屬於中產階級的台灣移民，到了澳洲後，因語言不通或證照不被認可，所具有的專業技能無法一展長才，但卻也不肯且無必要急於尋求其他可能較非技術性的工作而造成失業狀態。此外，台灣移民多為全家移民，但家中的經濟支持者卻常需要以往返原居地與移入國兩地的方式維持經濟來源，造成「太空人家庭」這種獨特的家庭型態以及「單棲媽媽」這個特殊角色。此外，台灣移民的另一特色則為具有投入宗教與志工團體的熱忱。

台灣移民遷移的特色為：動機方面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以及子女教育為考量，文化背景則較重視人際網絡，生活型態呈現妻小定居，丈夫往返兩地的「太空人家庭」方式，且在移民時常準備大量資金等。導致在居住地點選擇上，由於希望有較



好的居住環境、妻小就學與外出的便利性、加上經濟上的許可，因此常會在大都市的郊區購買房屋居住，且多為獨棟建築。另外，由於居住型態與當地人不同，加上台灣人移民時重視人際網絡，偏好有台灣人的地區居住，因此，當台灣人在一個地方居住後，常會產生連鎖性遷移，在當地形成台灣人聚居的情況。

在年輕移民的適應方面，年輕移民移居澳洲後，必須面臨的問題有：語言的障礙、課業的壓力、家庭型態的改變、人際關係的重新建立等問題。回流方面，年輕移民決定從澳洲回流台灣是受到工作就業、家人、婚姻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所做的決策。回流台灣後，他們同樣會有語文程度的不足、就業創業的壓力、與家人同住的壓力和缺少人脈等問題。在對自己身分的認同上，會受到當初移出時的年齡、家庭教育、同儕群體、移民初期的經驗，以及與台灣連繫的緊密程度等因素影響。而其文化認同則是融合台、澳兩種文化元素的混合式文化認同。但兩種文化的比重則受到移民時的年齡、家庭教育的影響、同儕群體、居澳時間的長短而有不同。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上，年輕回流移民的重心會放在事業的規劃上，然而工作地點的選擇方面，則較為分歧，有的人表示回流後發現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澳洲的生活，決定回澳洲定居；有的人滿足於目前工作的成就感，選擇繼續留在台灣就業；有的人表示將以台灣為基地，延伸到澳洲或其他地區；也有人表示，只要有好的發展就願意去嘗試，而不限定發展的區域。

## 1. 政策上的建議

經回顧澳洲台灣移民相關議題之研究後，作者擬將本研究的發現轉化為對移民專屬單位的建議：

### (1)積極提供移民行前資訊與必要輔導

台灣人移民到澳洲，最早遇到便是語言上的困難，連帶影響生活各方面的適應狀況；另一方面在經濟上為就業機會與就業適應問題。主管移民方面的政府專責機構，應可加強提供移入地方面相關訊息，如就業機會與狀況、居住地選擇注意事項等。在語言方面也可安排輔導課程或掌握移民語言狀況。雖然政府至今「移出從寬、移入從嚴」的移民政策仍未改變，但現今全球化趨勢中，人才即資本的概念已漸為各國認同；政府適度掌握移出的人力資本狀況，亦可為凝聚移民向心，進而提高國家在海外資本有所幫助。

### (2)加強對海外移民家庭的輔導

澳洲的台灣移民家庭經常面臨的問題有：男性家長回台灣工作，女性在澳洲獨



力照顧小孩所形成的「太空人」家庭和「單棲媽媽」現象、兩代親子之間融入澳洲文化程度不同所產生的文化衝突、以及子女在澳洲及台灣升學的相關問題。作者建議：駐外機構應結合當地移民社團的力量，經常舉辦一些和移民切身相關議的研習活動或是親職教育講座，讓台灣移民能夠獲得具支持性的社會網絡。如此對於移民在海外狀況的掌握，以及讓當地移民對於政府的觀感，都有正面的效果。

## 2. 未來研究議題

在回顧國內學者所做台灣甚至是華人移民海外的遷移研究後，尚且發現了幾項重要的議題值得另加深入探討，而目前國內對於相關方面的研究仍付之闕如，茲列舉如下：

### (1) 澳洲台灣年輕移民在澳洲的就業適應研究

本文針對澳洲回流台灣的年輕移民的回顧，他們回流台灣乃是考量就業機會、升遷管道、以及自身就讀科系與優劣勢評估下的結果。但是台灣人在澳洲真的就業不易嗎？選擇留在澳洲的年輕移民在澳洲勞動市場的就業情形如何？他們不回流的原因又是什麼？本文作者認為：若能針對就業的議題，比較回流年輕移民與不回流年輕移民的就業情形及就業適應，當更能看出澳洲與台灣在就業市場上的差異，也能了解這兩種類型年輕移民的不同特質。

### (2) 移民自我認同與國族認同

台灣移民到外國適應新的生活，並尋求發展，本身就帶有追求夢想的憧憬。而在跨文化情境的適應過程與主流社會文化差異的衝擊下，「自我」角色的定位為何？認為自己是主流社會的一員，從屬的少數族群，或甚至根本不與主流社會接觸的「異鄉客」？另外這些移民對於國族上的認同又是如何？認為自己是澳洲人？台灣人？華裔？亞裔？

### (3) 回流移民 (return migrant) 與往返移民 (circular migrant)

以澳洲為例，台灣移出人口多為全家移民，但部分經濟支持者仍兩地往返 (circulation)。另外，一些步入中老年的移民以及在澳洲當地完成學業的年輕一代，都有部分移民考慮甚至選擇回流台灣，這兩類移民雖在國籍認定上都擁有一固定身份，但是他們的移動使得國際遷移中，移入地與移出地間的界線變得模糊，回流與往返的移民具有什麼特色與特質？回流移民如何再次面對本來可能熟悉，現在卻又陌生的原居地？往返的移民對於自己在兩地所扮演的角色認知為何？

### (4) 台灣小留學生教育問題



台灣移民外移的重要原因，其中之一是為了子女的教育，而有時父母親無法陪同一起，或只能短暫陪伴孩子出國求學，而將孩子寄宿在父母的親戚或朋友家中，這些小孩便成了小留學生。小留學生經常是孤單一人在異地求學，而其背後卻滿載著父母的期望。這些留學生小小年紀便脫離父母的照顧，雖然或許有親戚與父母輩朋友的關心，但其在寄宿家庭中所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如何調適？這些小留學生的管教與輔導方式又應該如何，是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的。

#### (5)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及其他國家之台灣移民比較

由於各國接受移民的時空背景不同，造成的台灣移民在移民動機、背景條件、移民方式上有所不同，也由於移入後發展時間的長短不一、組織結構與移民參與程度不同、移民人口佔移入國人口比例的差異；這些差異是否使得在各國的台灣移民有著不同的生活型態與適應？

國際移民是一種跨國行為，所涵蓋的議題層面非常龐大且複雜，而過去人口地理學中所採用的理論，如推拉理論、或強調經濟面向的遷移理論，常採用巨觀、大尺度的研究視角，對於所影響到的家庭與個人層面，在地理領域研究上卻是少有討論的。然而地理學者在當前國際學術研究更應該嘗試多元研究方法 (multi-method)，以及跨領域議題的探討，並多累積移民研究的成果，才能使地理學者的研究進入國內社會科學移民研究的主流。

本文回顧的澳洲研究文獻，方法上採取多元研究方法進行，包括問卷調查、文獻蒐集、深入訪談、焦點座談、及參與觀察等同時並行；如此不僅能從內在的、個人的微觀面向出發，亦可同時兼顧社會經濟結構性、政策性的巨觀面向，且可同時採取量化與質化的資料，以求以較不偏頗的方式、以多面向的視角探討遷移議題，並擷取各研究方法的優勢。多元研究方法的使用，可為後續研究議題在方法上做一參考。由於過去鮮少有學者從事移地研究，台灣人口國際遷移的議題，在未來的移地研究領域中，必然具有相當的開創性以及延續性的特質。在全球化的人口變遷議題中，有廣泛的研究基礎及深度的見解是有必要的。

## 致 謝

本研究由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 93-2415-H-002-018-SSS)補助完成。本論文初稿曾發表於行政院研考會主辦之「21 世紀台灣新移民政策研討會」，2005 年 1 月 18 日。在此感謝兩位匿名評閱者提供的寶貴意見，並感謝徐榮崇副教授同意將圖 4 及相關論





文供本論文參考。

## 參考文獻

- 何翠萍 (1997) 美國華人社區社會組織的形式與變遷, 美國研究, 7(1): 157-198。
- 林芊 (1986) 美國芝加哥市華人社區組織發展初探, 社區發展季刊, 34: 62-66。
- 林芊 (1987)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from Taiwan,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23: 126-151。
- 姜蘭虹、趙健雄、徐榮崇 (1998) 當代華人的海外移民,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報, 24: 59-84。
- 姜蘭虹、徐榮崇 (2000) 區位決策與就業適應 — 以雪梨的台灣移民為例,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報, 27: 1-20。
- 姜蘭虹、徐榮崇 (2003) 澳洲台灣移民現況之研究, 台北市: 僑委會。
- 姜蘭虹、宋郁玲 (2001) 移民就業類型與適應 — 以澳洲台灣移民為例,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報, 29: 1-26。
- 徐榮崇、姜蘭虹 (2001) 澳洲台灣移民居住地選擇因子與遷徙過程 — 以雪梨和布里斯本為例,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 29: 39-72。
- 徐榮崇 (2002a) 澳洲台灣移民的居住地選擇與決策過程 — 以雪梨、布里斯本及墨爾本為例, 博士論文, 台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研究所。
- 徐榮崇 (2002b) 澳洲移民政策的變遷與台灣移民, 市師學報, 台北市: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33: 379-388。
- 徐榮崇、姜蘭虹 (2004) 澳洲台灣移民的空間性與地方性 — 以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思考,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學刊, 28: 87-107。
- 徐榮崇、姜蘭虹 (2003) 澳洲台灣移民現況之研究, 台北市: 僑委會。
- 徐榮崇 (2003) 澳洲墨爾本地區台灣移民的居住地分布與偏好,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 34: 91-116。
- 馬宗潔 (1999) Intergenerational Gap in Acculturation and Parenting Behavior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Mothers,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29: 207-234。
- 陳靜瑜 (1998)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華僑社會嬗變的狀況探析, 1950~90, 興大歷史學報, 8: 229-270。
- 陳靜瑜 (1996) 美京華埠的近貌及其面臨的問題, 文史學報 (中興大學), 26: 263-280。



- 陳靜瑜 (2003a) 美國台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認同析探 (1980~2000) (上), 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3(3): 1-37。
- 陳靜瑜 (2003b) 美國台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認同析探 (1980~2000) (下), 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3(4): 37-74。
- 曾熾芬 (1997) 居留權商品化: 台灣的商業移民市場,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7: 37-67。
- 張存武、湯熙勇 (2002) 海外華族研究論文集, 台北: 華僑協會總會。
- 蔡宏進 (1988) 台灣人口出國外移及其與社會經濟的關係, 台灣銀行季刊, 39(4): 277-300。
- 廖珮君 (2005) 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2001) Unpublished Census Data, 1986, 1991, 1996, 2001.
- Beal, T. & Sos F. (1999) *Astronauts from Taiwan: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Life*, Kaohsiung, Taiwan: Asia Pacific Public Affairs Forum.
- Burnley, I. (1998) Immigrant City, Global City?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among Communities from Asia in Sydney, *Australian Geographer*, 29(1): 49-70.
- Burnley, I. (2001) Dimensions of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since 1788. In I. Burnley (ed.)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Australia—A Demographic Approach*. Pp. 27-45. Victo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N. (2001) Taiwanese. In J. Jupp, (ed.) *The Australian People—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 Pp. 701-2. Melbourne,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N. (2004a) Dynamics of self-employment and ethnic business among Taiwanese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2(2): 153-173.
- Chiang, N. (2004b) Middle-class Taiwanese immigrant women adapt to life in Australasia: Case studies from transnational households. *Asian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10(4): 31-57.
- Chiang, N. & Kuo, L. (2000) An examina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9(6): 459-481.



-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3)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United in Diversity* — Updating the 1999 New Agenda for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2003-2006, <http://www.dcita.gov.au/cca>.
- Guo, F. & Iredale, R. (2003) The view from Australia. In R. Iredale, F. Guo and S. Rozario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Pp. 26-45.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Hugo, G. (1995) *Understanding Where Immigrants Live*.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Inglis C. & Wu, C. (1992) *Asians in Australia: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Ip, D., C. Wu & Inglis, C. (1998)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the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Review*, 22(1): 19-97.
- Ip D. (2001) A Decade of Taiwanese migrant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Comparisons with Mainland Chinese and Hong Kong settler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3: 113-145.
- Ip, M. (2003) Seeking the last utopia: The Taiwanese in New Zealand. M. Ip (ed.)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Pp. 185-210.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 Jayasuariya, L. & P. Kee (1999) *The Asianisation of Australia?*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Jupp, J. (1997) From White 'Australia' to 'Part of Asia': Recent shifts in Australian immigration policy towards the reg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1): 207-228.
- Kalantzis, M. (1997)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Australian Experien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ia and New Asian Immigration: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May 30-31, 1997,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Kee, P. & Skeldon, R. (1994) Th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Hong Kong Chinese in Australia. In R.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Pp. 183-196. New York: M. E. Sharpe.
- Kitano & Harry H. L. (1969) *Japanese Americans: The Evolution of a Subculture*.



-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orporation.
- Lack, J. (1995) *Bold Experiment: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 Since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quian, E., Laquian, A. & McGee, T. (1998) *The Silent Debate: Asian Immigration and Racism in Canada*. Vancouver: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Levitt, P. & Waters, M. C. (2002) Introduction. In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1-30.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s.
- Mak, A. (2001). *Relocating Careers: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akkai, T., McAllister, I. (1993) Immigrants in Australian society: backgrounds, attainment and politics. In J.M. Najman and J. S. Western (eds.) *A Sociology of Australian Society —Introductory Readings* (2<sup>nd</sup> ed.) Pp. 178-212. Melbourne: 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
- Man, G. (1995) The experience of women in recent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from Hong Kong: An Inquiry into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4(2-3): 303-326.
- Man, G. (1996) The experience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recent Hong Kong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Canada. In M. Lynn (ed.) *Voices: Essays on Canadian Families*. Pp. 221-244. Toronto, ON: Nelson.
- Pe-pua, R., C. Mitchell, R. Iredale & Castles, S. (1996) *Astronaut Families and Parachute Children: The Cycle of Mig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Canberra: Bureau of Immigration, Multicultural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 Schak D. (1999) Middle-class migration and problems of adjustment: Taiwanese business migrants in Brisbane. In Y. F. Tseng, C. Bulbeck, N. Chiang and R. Hsu (eds.) *Asian Migration: Pacific Rim Dynamics*, Monograph No. 1. Taipei: Interdisciplinary Group for Austral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Simon, R. & Lynch, J. (1999)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s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3(2):

- 455-467.
- Skeldon, R. (1994) (ed.)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 Skeldon, R. (1997) Migrants on a global stage: the Chinese. In P. J Rimmer (ed.) *Pacific Rim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Era*. Australia: Allen & Unwin.
- Stalker P., 蔡繼光譯 (200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國際遷移與移民), 台北: 書林。
- Tam, M. (2003) Empowering mobility: 'Astronaut' women in Australia. In E.W.Y. Lee (ed.) *Gender and Change in Hong Kong: Globaliz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ese Patriarchy*. Pp. 177-199. Vancouver: UBC Press.
- Waters, J. L. (2002) Flexible families? 'Astronaut' household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lone mothers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3(2): 118-134.
- Western, J. S. (1983) *Social Inequality in Australian Society*. Melbourne: Macmillan.
- Wong, L. L. (2003) Chinese business migration to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te, policy and the global immigration marketplac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2(3): 301-335.
- Wong, L. L. (2004) Taiwa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anada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2(2): 113-152.
- Wu, C. T. (2003) New middle-class Chinese settlers in Australia and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 in Sydney. In L. J. C. Ma & C. Cartier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年02月10日收稿

2005年04月11日修正

2005年05月10日接受



## Current Research on Taiwanese Immigration to Australia

Chih-shiang Yang<sup>\*1</sup>、Lan-hung Nora Chiang<sup>\*2</sup>、Pei-chun Liao<sup>\*3</sup>

### 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tterns occurring in Taiwan opens up new research frontiers and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popula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examines past and current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aiwan, focusing on recent studies on Taiwanese immigrants to Australia. This overview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methodology, major findings, as well as policy implications.

Among the New Asian immigrants heading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Taiwanese immigrants have moved for similar but different reasons from other Chinese speak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Hong Ko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political tension across the strai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business migration policies by various countries targeting skilled and entrepreneurial groups come foremost. The desire for better educ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pursuits for a better life style, and the relaxation of restrictions permitting citizens to go abroad as tourists starting in 1989, are also critical factors in the decision to move overseas, mainly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Census shows that Taiwan-born business and skilled migrants who settle in Australia have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despite being well educated and fairly affluen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aiwanese immigrants find it difficult to secure employment, start profitable businesses, and adapt to the host society. 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s include: lack of fluency in English,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

\*1.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

M. A.,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Taipei Municipal Teachers College



milieu, lack of familiarity with Australian business culture and labor relations, complex rule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small size of the market, high taxes, and lack of willingness to take up work not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n the other hand, a high homeownership rate among Taiwanese migrants has been found, indicating a reward for their quest for a better life-style offered by their home country. The locational decisions and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of Taiwanese migrants in Sydney, Brisbane and Melbourne are studied in detail. The main reasons for choosing to settle in Sydney are favorabl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Sydney is preferred. Those who chose Brisbane are attracted by the good climate there, and the residents preferred the Sunnybank area. Melbourne is chosen for the good education it offers, and areas on transportation lines near good schools are selected. Their locational choice depends on income and housing budget, proximity to good schools, shopping centers, and information from friends or earlier migrants. Changes for residential choice reflects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nd experiences, life-cycles, and fluctuating housing prices.

While the age-sex structur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s in favor of young males in the age group of 15-24 and women between 35-54, these two groups are seldom studied as they are “passive” movers in the male-dominated household. A gender-sensitive dimension has been taken to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s and types of problems faced by women who stay in Australia with their children during their education, while the migrant men moved back to Taiwan or other countries to make a living.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labor market, the women living as “*tan chi ma ma*” try to balance the needs of the husbands and the children, and suffering a number of disadvantages in their new environment. However, they frequently enjoyed an autonomy and freedom from responsibilities that they had to fulfill toward their extended families in Taiwan. Apart from the mutual support and bonds among other migrant women, they benefited considerably from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aiwanese associations of various kinds, including working as volunteers in the host society.

Whil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mmigrants returned from their host countries, this new pattern of circular Chinese diaspora has never been studied.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young first generation Taiwanese immigrants to Australia show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turning young Taiwanese migrants who has finished their education in Australia. While joining the job marke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establishing their careers in Taiwan, their adaptation and their self-identities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are complex in substance. Before returning, most of them have evaluated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job markets in Taiwan and Australia. In addition, reunions with their families in Taiwan, search for potential spouse, and their affection towards Taiwan have all been important factors to effect their decisions. Due to their constant need to adapt to both Taiwanese and Australian environments, they have developed a dual identity that encompasses both cultures, in which they strive to seek after the best of the two worlds.

**Keywords:** Taiwanese migrants to Australia, employment and social adaptation, residential choice and mobility, “*tan chi ma ma*”, return young Taiwanese migrants

